

新中国成立后的港澳工作

罗燕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北京 100009)

摘要:“暂不收回”香港澳门不是一项简单的政策,而是一个深谋远虑的复杂战略。中国政府一方面对港澳地位前途不做公开承诺,最大可能地争取英国实行有别于美国的对华政策,另一方面通过推进港澳工作,加强中国政府在港澳地区的实际存在。新中国的港澳工作继承了此前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传统,同时又发展出了适应港澳环境的新特点,如实行内外有别的工作方式,将港澳工作与内地工作区别开来,仅向港澳同胞宣传爱国主义,拉近他们与祖国的情感联系,引导他们正确认识内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行适应英葡法律环境、不以推翻殖民统治为目标的维权活动及合法斗争等。本文根据现有史料和研究成果,概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港澳工作的方方面面。

关键词:新中国初期;“暂不收回”方针;港澳工作;新华社香港分社

DOI: 10.3969/ J.ISSN.1672-0911.2022.02.053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0911(2022)02-0053-09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决定将香港和澳门排除在人民解放军进军的范围之外,对港澳两地作出了“暂不收回,维持现状”的决策。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在这一方针指导下,根据港澳的实际情况和特殊环境,制定了相应的港澳政策,建立了港澳工作领导体制和处理港澳事务的机构,争取驻港机构的合法地位及与港英当局正常往来,开展了以宣传爱国主义、联系港澳同胞和服务国家战略需要为主要内容的港澳工作。

一、中国领导人关于“暂不收回”港澳方针的论述

由于中国政府没有公开正式地表明立场,长期以来无论党内国内还是国外友人和西方国家,都对中国的港澳政策怀有诸多疑惑,在不同场合向中国领导人寻求答案。中央政府为了推进工作也需要在一定范围对有关部门明确港澳方针和政策。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多次就港澳

问题阐述中国政府“暂不收回,维持现状”的主张。这些论述起初是关于党内工作的指示,后来包括对国际友人作出的相关解释。

1951年春天,周恩来向新华社驻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阐述了中国政府的港澳政策和战略思考。他说:“我们对香港的政策是东西方斗争全局战略部署的一部分。不收回香港,维持其资本主义英国占领不变,是不能用狭隘的领土主权原则来衡量的,来作决定的。我们在全中国解放之前已决定不去解放香港,在长期的全球战略上讲,不是软弱,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更积极主动的进攻和斗争。”^{[1]4}

1954年8月,周恩来为接待英国工党访华团,在一次干部会议上就中英双方的谈话议题指出:“不成熟的问题,也不要谈,例如香港问题。香港一百多年前是中国的,香港的居民绝大多数是中国人,大家都认为香港是中国的。至于我们是否要收复香港,如何收复,政府还没有考虑过,我们就不要谈。”^[2]

收稿日期: 2021-11-08

作者简介: 罗燕明(1952—),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及本所一国两制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引用格式: 罗燕明. 新中国成立后的港澳工作[J]. 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2(2): 53-61.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1956年5月,毛泽东主席在广州听取中共广东省委关于港澳问题的汇报时指出:“英国对我们的政策是看见的,它要和我们做生意,美国也要来的,明年不来,后年也会来的。香港暂时还是不收回来好,我们不急,目前对我们还有好处,现在拿过来不见得有利。”^[3]

1959年10月,毛泽东会见苏联驻华临时代办安东诺夫,针对赫鲁晓夫在炮击金门和中印边境问题上指责中国好战,驳斥说:“在中国的大陆上还有一个殖民地,这就是澳门。我们中央的方针是目前不拿,让它去。有人说我们好战!你看,这是好战吗?”^{[4]213}

1961年1月,毛泽东会见来自非洲一些英葡殖民地国家的反殖政党和团体的访华团,向他们解释了中国政府暂不收回港澳的政策:“葡萄牙在我国现在还有一块小殖民地,我们只要用一个指头,他们就会跑掉。为什么不用一个指头把他们赶跑,让他们留着呢?这是因为首先台湾还由美国人占领着;其次还有香港,由英国人管理着;第三才是葡萄牙管理的澳门。让他们管理几天,也许几年,也许更长一点时间。那些地方不大。我们先把最大一块弄好,那三个地方将来再说。”^{[4]530-531}

1963年8月,毛泽东在与索马里总理舍马克的谈话中又谈到这一问题:“至于香港,英国没有多少军事力量,我们要占领是可以的。但过去有条约关系,小部分是割让的,大部分是租的,租期是99年,还有34年才满期。这是特殊情况,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舍马克总理感到不解,问“如果香港人自己要解放,把英国赶走,能拒绝帮助吗?”毛泽东回答说:“香港人就是我们中国人。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的贸易关系都不利。我们不动它并不是永远不动它,英国现在安心,将来会不安心的。”^[5]

在美苏冷战和中苏论战的背景下,苏联大家庭的一些国家和政党对中国暂不收回港澳颇有微词。1961年12月印度没有经过谈判直接出兵从葡萄牙手中收复果阿后,苏共、美共等一再拿此事件与中国的港澳政策相比,企图证明中国政府是光说不练的胆小鬼。1963年3月,中国政府通过《人民日报》社论指出:“中国人民并不需要在香港、澳门

问题上显示武力,来证明自己反对帝国主义的勇气和坚定性。”“香港、澳门这类问题,属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问题”,对此类“历史遗留下来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一贯主张,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经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未解决以前维持现状”^[6]。

中国领导人为什么决定暂不收回港澳,概括来说有两大原因。一是争取英国,分化美英同盟,增加西方国家联合干涉中国内战的困难,保障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二是胜利之后利用港澳地区特别是香港的特殊地位,“发展海外关系和进出口贸易”,打破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封锁。

二、中国领导人关于港澳政策的论述

暂不收回港澳的决策必然伴随港澳政策的出台。港澳工作在相当长时期内属于秘密工作,我们至今很难发现有关港澳工作及其政策的正式的公开文件,只能读到国家领导人的一些相关讲话,有的讲话还缺少现场记录,只能凭当事人后来的回忆才能知晓内容。这些讲话林林总总不少,较重要的讲话有几次。

1951年春,周恩来对香港新华社黄作梅社长就港澳工作作出口头指示。指示可分为对英和对港两个方面。关于对英,他指出,艾德礼政府主要是为了保全大英帝国在远东的殖民地的利益,保存大英帝国在远东政治经济势力范围的实力。在这个范围内,美国和英国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因此,在对华政策上也有极大的分歧和矛盾。美国要蚕食英国在远东的政治经济势力范围,英国要力保大英帝国的余晖。那么,保住香港,维持对中国的外交关系是英国在远东的战略要招。我们把香港留在英国人手上比收回来好,也比落入美国人的手上好。香港留在英国人手上,我们反而主动。我们抓住英国一条辫子,我们就拉住了英国,使它不能也不敢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和远东战略部署跟得太紧,靠得太拢。这样我们就可以扩大和利用英美在远东问题上对华政策上的矛盾。当然,我们也要反对英国过分支持美国孤立中国的反华政策超过我们的安全 and 国家利益所能容忍的程度。此外,我们只抓一条,反对英国支持美国在亚洲镇压民族解放运动,例如朝鲜和越南。

关于对港工作问题，周恩来指出，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开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支持我们的反美斗争，支持我们的国内经济建设。香港是我们通往东南亚、亚非拉和西方世界的窗口。它将是我们的瞭望台、气象台和桥头堡。它将是我们的突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的前沿阵地。近两年的发展证明我们在解放全国时留下个香港是正确的。一定要认识这个重大的战略意义，一定要相信中央这个重大决策。你们要好好保护它，不要破坏它。要维护香港的现状和地位，包括英国的殖民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制度。要承认香港在英国的远东势力范围内的特殊地位和特殊利益^[1]。

1956年5月28日，毛泽东听取中共广东省委关于港澳工作的汇报。在提到宣传工作时，他认为香港《大公报》等最近降低调子很对，指出能够利用香港一些报纸登一些对我们有利的东西，透到台湾去，这就很好了。要他们不骂我们是不可能的，这样它就会起不了这个作用。一条消息又骂又帮是可以的，七分骂我、三分帮我这才对头。在汇报到争取港澳华侨投资问题时，指出要有更积极的政策。港澳华侨拿外汇来拿外汇走，这是合理的，这对我们并无所损。就作为存款性质吧，在一定期限内，例如一年，他们可以拿外汇来，一年后随时可以拿外汇走，这样就可以来来往去了。但有一条，钱怎么用他们不要去管，由国家来计划使用。股息多少、股息给不给外汇，这个问题可以研究。要针对港澳华侨的顾虑，想办法争取利用这一大笔外汇^[4]580-581。

1957年4月28日，周恩来总理在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讲话，谈到了香港问题。当时内地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他重点讲了中央对香港实行与内地不同的政策，指出：“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连英国也可能这样想。”“我们不能把香港看成内地。对香港的政策同对内地是不一样的，如果照抄，结果一定搞不好，因为香港现在还在英国统治下，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该社会主义化。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我们在香港的企业，应该适应那里的环境，才能使香港为我所用。”香港应该化为经济上

对我们有用的港口。对在港的民族资产阶级，过去合作过，将来还可以合作。“港澳的同胞不要担心前途。他们当中如果有些人主动坚决要求回来，可以同意，但不要动员他们回来，要让他们留在那里经营自己的企业。我们可以同他们内外合作，不使人家吃亏。至于有些人一时还不相信我们，对我们的政策有怀疑，可以让他们再看一看，看一二十年都可以。我们不要歧视他们，责怪他们。如果内地有一些人想出去，也是允许的。”但也不是主动去号召。“不要强留一些人在内地，有些人在外面过一阵还会回来的，凡有爱国心的人，我们就欢迎，对他们不要强劝回来，也不强留。”现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胜利了，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香港可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我们要打开局面，就得对香港的民族资产阶级讲清政策，使人家有利可图”^[7]。

1961年3月13日，朱德在港、澳出口工作会议上指出：“最近几年，我们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做得比较多些，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做得比较少。今后，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额要增加一些。港、澳是自由港，离我们又近，是我们对资本主义国家出口的一个很好的阵地，我们应该抓住这个阵地。”^[8]

三、港澳工作领导体制和机构

从土地革命起，中国共产党不再以推翻港英统治为目标，而是利用港英造成的特殊环境为内地反蒋武装斗争服务。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创了与港英合作的局面。战后初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争取到了英方和港英在国共内战中的相对中立和不介入。1949年8月，刘少奇访苏结束时向斯大林提交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城市工作是成功的，在“上海、南京、北平、天津、武汉、香港、广州等大城市”建立的党的秘密组织和群众组织，“对于我们军队去攻占城市及在占领后接收与管理城市，起了很大的作用”^[9]52。

中国政府暂不收回港澳延续了这一传统，在已有基础上开展对香港澳门的工作，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从内地到香港的港澳工作秘密领导体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设立政

院华侨事务委员会（中央侨委），兼管港澳事务。侨委主任委员是何香凝，副主任委员有李任仁、廖承志、李铁民、庄希泉。廖承志负责港澳事务。

1952年中央华南分局合并了港澳两地的工作，设立了港澳工委，负责管理港澳两地的党组织。1955年华南分局撤销，港澳工委归属新成立的中共广东省委代管。

1958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中共中央设立外事小组和国务院设立外事办公室的联合通知》。国务院外事办是国务院管理外事工作的总口子，同时又是中共中央外事小组的办事机构，协助国务院管理外交部、对外贸易部、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和华侨事务委员会的工作，港澳事务包括在内。1964年国务院外事办内设港澳组，专司港澳事务。陈毅外长兼外办主任，外办副主任廖承志兼港澳组组长。1970年6月，国务院外事办撤销，港澳事务并入外交部^[10]。

新华社香港分社是中国政府默认的派出机构。最初由中共中央南京局周恩来指派，1947年2月起筹备，5月1日正式对外发稿，宣布成立。首任社长乔冠华，副社长肖贤法。社址设在九龙尖沙咀弥敦道172号楼3层。香港分社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掩护机构，经过了港府注册。英国害怕中国统一后形成强大政府，危及对港统治，故对国共内战采取与美国不同的中立政策，同意中国共产党在香港设立这个机构，对外发布新闻，供人订阅。

1949年8月，黄作梅接替乔冠华任第二任社长。1955年4月黄作梅在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中遇害后，由总编李冲主持分社工作。从1958年起，第三任社长由梁威林担任，副社长先后有祁烽、梁上苑、朱曼平、李菊生、朱毅等。祁烽来自中共广东省委。梁上苑、李菊生、朱毅由外交部派出。朱曼平由侨委派出。

新华社香港分社的职能分为外事与内事几个层次，除从事一般的新闻工作与新华社总社无异外，其外事使命是充当中国政府驻港代表机构。中国不承认英国对香港的主权，拒绝在港设立领事馆；英方则害怕香港形成两个权力中心，拒绝中方设立公署一类的官方派出机构。在这种情况下，由新华社香港分社代行中方代表机构之职，成为双方都接受的唯一选择。当中国政府有事需与港英当局磋商时，

可授权香港分社前往交涉。又因为这类交涉属外交事务，涉及外交政策，1960年外交部向新华社香港分社派驻梁上苑担任副社长，主持外交事务。港英当局拒绝给予香港分社人员以外交往遇，只授权警署出面接洽，直到1967年反英抗暴事件发生后，才批准港督政治顾问按外交礼仪会商新华社香港分社^[11]。

同时，香港分社还统一领导或协调内地有关部门的驻港机构和在港活动，使之符合党和国家的政策。这些机构有华润公司、香港招商局、南洋银行、《大公报》《文汇报》、澳门南光公司等。

香港分社另一重要工作是联系、团结、发展香港爱国爱港力量，包括劳工、工薪阶层的工会、社团等，在复杂环境中开展反美反蒋斗争，举行罢工等，向英方和资方争取政治权利与经济利益，改善港人生活待遇和劳动条件。

海外华侨回国探访、旅游、从事商务，通常经过香港进入内地。中国政府把香港澳门作为联系广大海外华侨和从事海外侨务工作的重要渠道和基地。香港分社承担的爱国统一战线和宣传工作，除面向港澳同胞外，还要面向广大海外侨胞。

香港分社管理的诸事项，外事工作由外交部领导，海外侨务归国务院侨委领导，内事工作则归中共广东省委领导。广东省委内设负责港澳工作的专责办公室。

中共港澳工委作为党内领导机构设在香港分社内，由社长副社长分任书记和副书记。国家领导人的讲话精神和中央的有关政策方针可不经新华社总部直接下达给香港分社在香港地区贯彻。香港分社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领导。

四、香港分社领导的几项工作

香港分社的领导方式和活动方式与中国共产党在敌占区和国统区的地下工作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很大不同。后者处在完全的秘密状态，且充满危险。香港分社是公开合法的机构，统一领导中央政府各个驻港机构，通过他们开展公开活动。这种领导关系是秘密的，采取内外有别的原则。

（一）创办和掌握爱国报刊

新中国成立时，为适应“暂不收回”港澳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从香港地区撤回了《华商报》《群

众》等党报党刊，留下了爱国主义的宣传阵地，利用港英法律，通过合法注册，保存或创办爱国报刊，推动爱国出版业和电影业在香港发展。

中共创办和掌握的爱国报刊有公开的进步报刊，如《大公报》《文汇报》《周末报》《经济导报》《新中华报》；还有半公开或未公开的外围进步报刊，如《新晚报》《香港商报》《长城画报》《中联画报》《新电影画报》《晶报》《幸福画报》《海光杂志》《采风通讯社》《小朋友》杂志等；以及与中方有来往的中间报刊，如新新通讯社、新亚通讯社、《澳门华侨报》《大众报》《世界画报》等。

《大公报》1902年创办于天津，1926年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接办后奉行自由主义，以及“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办报方针，国共之间偏右。抗战爆发后先后开辟过汉口版、香港版、桂林版、重庆版等。战后《大公报》主张第三条道路。这一梦想被国民党发动的反人民内战彻底击破，遂使该报改变立场。1948年3月香港版复刊后很快被中共地下党掌控。是年11月，香港《大公报》发表总编王芸生撰写的社评《和平无望》，宣布起义，“向人民靠拢”，逐渐成为左派阵营的报纸^[12]。1951年《大公报》在香港重新注册，费彝民任报社社长。

《文汇报》原是1938年1月由严宝礼等人在上海公共租界创办的一份宣传抗日救国的爱国报纸。1939年5月在日本压力下被迫停刊，日本投降后迅速复刊。复刊后的《文汇报》高举“反内战、反独裁、争民主”的旗帜，积极靠近中共。1947年5月又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编辑记者遭到追捕和逮捕，领导人逃亡香港。1948年9月，香港《文汇报》在中国共产党和民革的推动下创办。李济深任董事长，徐铸成任总主笔，马骥良（唐纳）任总编辑，严宝礼任总经理。《文汇报》接受中共香港分局的领导。主持《华商报》的香港分局委员夏衍要求《文汇报》色彩不要太浓，以“中间偏左”姿态出现，万一《华商报》被封，可以顶上去^[13]。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上海《文汇报》复刊，吸引不少香港故旧返沪，而香港《文汇报》则继续出版，遂成两家兄弟报纸。1951年4月，香港《文汇报》人事变动，孟秋江任社长，司马文森任总主笔，李子诵任总编辑^{[14][37]}。

1950年10月，为了利用外国通讯社的稿件，迅速报道朝鲜战争的战况，《大公报》分出一部分人力创办了《新晚报》，由罗承勋（罗孚）负责。《新晚报》有意走“灰色”路线，突出报道香港社会新闻、体育赛事和“马经”，并且开辟了武侠小说栏目，约请陈文统（梁羽生）和查良镛（金庸）提笔连载，深受港人喜爱。

香港《商报》是从《经济导报》分立出来的。后者是中国共产党一些经济学者和记者于1947年1月筹资在香港创办的一家周刊，强调“在商言商”为掩护，以工商界、学界人士为阅读和团结对象，重点报道香港和内地的经济情况，揭露国民党的经济政策和官僚资本，为党培养经济及新闻工作人才。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导报》的大部分人员返回内地，留下人员继续出版。1952年春，香港发生“三一”事件。《大公报》《文汇报》《新晚报》受到港英当局检控面临停刊危险。香港工委决定把《经济导报》已注册好的一家小型报纸《香港标准行情报》改名《商报》作为三大报的备胎。平日不显山不露水，三大报一旦停刊，《商报》便可启用，以发挥政治影响。1952年10月《商报》创刊，张学礼任总编辑、李沙威任编辑主任，李少雄任督印人兼经理。《商报》作为香港工委掌握的第四家报纸，继承了“在商言商”的传统，后改为综合性报纸，仍强调“中性”的大众化的办报路线，不参加任何反英反美活动，以报道香港社会新闻、满足港人文化经济生活为主要内容。

香港《晶报》前身是《明星日报》，由拥护新中国的爱国报人创办于1956年5月，首任社长钟萍，改名《晶报》后，钟萍任督印人，泰国华侨王以达任社长，陈霞子任总编^{[14][42]}。当时中共中央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任务。香港工委根据中央精神给《晶报》的指示是“要从侧面配合”这一工作，把报纸办给香港、海外、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看，使他们看得进去。陈霞子与钟萍商议后提出，“右手一部《四书》，讲孔孟之道；左手一部《三民主义》，讲国父孙中山的统一建国之道，‘世界大同’之道。”这一方案经新华社香港分社上报中央后，得到了周恩来的批准^[132]。《晶报》通过这些办法很快打入了台湾地区。

上述五家爱国报纸实质上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报

纸,但在经营上与其他报刊,包括一些爱国的私人报刊,没有明显区别,一般都是合法注册,以股份制和商业方式运作,如有中央财政补助,也进入香港中资银行的私人账户^{[1]13}。办报方针是中共中央确定的,香港工委和分社具体指导。

负责港澳工作的中央领导人有周恩来和陈毅,部门领导是廖承志。从1951年初起,他们多次对香港办报方针作出重要指示。主要精神是,不要办成党报,要以民间面目出现,不要宣传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只宣传爱国主义,爱国主义的标准不能太窄,要用在所有港澳同胞身上等^{[1]18-24}。1956年6月,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侨委党组关于港澳报刊工作的报告。报告指出,港澳报刊工作不应照搬内地,主要面向港澳广大人民,适当地面向海外华侨,适当降低调子,争取团结中间报刊,扩大同盟军,利用反动报刊,进行解放台湾的宣传,建立敌工阵地等^①。1959年12月,廖承志会见香港新闻界参观团,发表了“坚持爱国主义的办报方针”的重要谈话,指出:“我们办的报纸有两类。主要的一类是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这就是内地的报纸。”“另一种报纸,是在香港和海外办的报纸……是以爱国主义为方针的。”“进行爱国主义宣传的报纸,实质上就是祖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香港报纸必须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爱看的报纸,这才真正能完成爱国主义宣传的任务。”“我们所说的要办大众化的报纸,意思就是我们的报纸不要脱离香港大多数人民的觉悟程度,而是去适应他们现在的水平。我们办大众化报纸的目的,不是去迎合低级趣味。”^[15]

在上述方针下,五家报纸各有分工和侧重,不仅发行量上去了,而且还吸引了一些民间报纸向祖国靠拢。到“文革”前,香港爱国报纸的发行量已达到全港2/3^{[1]82}。

(二) 开展爱国出版工作

出版工作是中国政府对港统宣工作的重要部分。新中国成立后,香港工委和新华分社领导的出版机构主要有三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均来自内地。

三联书店的前身是193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白区先后创办的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新知书店。解放战争全面打响后,三家出版机构的骨干力

量从国统区转移到香港开展业务。1948年10月,根据上级指示三家书店在香港合并为三联书店,成立总管理处,并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49年5月,三联书店总管理处迁至北平,留下6人组成香港三联书店。7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三联书店今后工作方针的指示》,指出:“在全国新民主主义的出版事业中(暂时除了台湾以外)新华书店应成为主要负责者,三联书店应成为新华书店的亲密助手与同行,但在香港,在一个时期内,三联仍是革命出版事业的主要负责者。”^[16]

商务印书馆1897年创办于上海,1914年即在香港设立分馆,承担内地图书的出版发行。1947年又在台北开设台湾分馆。新中国成立后,台湾分馆脱离总馆独立,改名台湾商务印书馆。1954年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由上海迁往北京,实行公私合营,与高等教育出版社合并。香港分馆保留了商务印书馆的名称,由内地广州出版部门派人管理^[17]。

中华书局创办于1912年,1927年设立香港分局。1949年书局一些上层人物迁台后成立了台湾中华书局,留下的员工迎来了解放。

新中国成立前,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作为中国规模最大的民营企业,经历了新旧两次民主革命的洗礼。抗战期间,两家出版公司一方面坚持了民族气节,另一方面遭受了官僚资本的侵入和控制。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在广大公司员工中发展了革命进步的力量。人民革命的胜利澄清了这一政治分歧,两家出版公司都被台湾海峡一分为二。留在大陆的主体部分通过公私合营成长为国营出版机构,伸向香港的部分被党和国家赋予了爱国主义教育、宣传和统战的使命。

1956年5月,有关部门召开了港澳及海外出版工作座谈会,港澳地区及海外出版界派代表出席了会议。当时,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毛泽东在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提出了“双百方针”。在此背景下,座谈会讨论了港澳地区出版事业的方针。国务院外办副主任廖承志到会讲话,认为港澳出版应不同于内地,内地可以计划化,港澳行不通。他就港澳和海外出版事业的方针,提出“因地制宜,我行我素,自给自足”。他指出:我们的工作应该是为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服务,面向海外。希望香港各书店多编一些为海外读

者所喜欢的读物，帮助港澳同胞东南亚侨胞进一步认识祖国，热爱祖国。在内容方面应注意不要触犯当地的政策、法令，不要出版当地禁止出版的东西，也要照顾华侨的政治和文化水平。在内容的审查上，港澳和海外应比内地宽，如张恨水的小说内地已经出版了，港澳和海外当然更可以大量出版。当地不欢迎的书，最好不要出版。如关于武装革命等理论书，就不要在港澳和海外出版发行，以免引起当地的猜疑和误会。关于使用简体字的问题，不要着急，以后再逐步采用。各地可以办一些画报和杂志，内容要健康一些，把每一本杂志都办出特色来。希望多出版一些青年读物，内容可以包括文艺、体育、民间故事等方面。关于教科书的供应问题，内地主要是起“种子”的作用，港、澳及国外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编新的教科书，但是要注意下面三点：一、不能灌输奴化教育，不要有殖民地气味。二、不要有对祖国不利的东西。三、不要有对当地人民不利的东西^[18]。

香港出版业深受内地影响，从人员、技术、资金、设备到出版内容、销售范围和读者队伍，都与内地密不可分。抗战爆发、香港沦陷、日本投降、内战爆发直接影响了香港出版业的兴衰。新中国的成立极大地激发了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中国政府关于港澳和海外出版事业的方针适应了这种需要，推动了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在港澳本地的生根开花结果，并通过香港在广大海外侨胞中传播。三联、商务、中华三家大型出版机构为战后香港出版业的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鼓励爱国电影事业

港澳统宣工作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促进爱国电影的发展。为了发展反美爱国统一战线，中国政府大力支持聚集香港的革命进步影人以重组、联合、加入等方式，先后组建了长城制片有限公司、凤凰影业公司和新联影业公司，同时推动其他民间爱国电影公司的成长。长城公司的前身是旧的长城影业公司，1950年改组为新的长城公司。凤凰公司成立于1952年。长城、凤凰从事国语电影的创作。新联也成立于1952年，是一家粤语电影公司。三家爱国公司的员工多来自内地上海。他们继承了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优良传统，秉持爱国、进步

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精神，顶住港英当局的迫害和国民党势力的捣乱，发展了香港左派爱国电影事业。五六十年代是香港左派电影的辉煌时期，影片产量、质量、品种、票房收入以及社会影响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涌现出大批优秀作品，受到港澳地区和海外同胞的欢迎，有些作品被批准内地放映。

1964年8月北京召开香港电影工作会议。经过新中国成立后十几年的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香港电影工作与内地电影在题材、内容、形式、风格等方面已形成越来越大的差别。怎样理解这些差别成为会议讨论的重要问题。廖承志在总结报告中肯定了香港电影工作在“宣传祖国、鼓动国外侨胞的爱国主义”“宣传反抗帝国主义、反抗殖民主义”等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就会议讨论的若干问题提出指导意见，指出香港电影是“祖国电影事业的一部分”，是祖国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电影的“侧翼”和“补充”。香港电影是民族民主革命的电影，是为反帝反封建服务的电影，题材很宽广，可以上下数千年，从反封建礼教一直到反专制压迫，从反对封建剥削一直到反对帝国主义，还有各式各样的斗争形式，直到武装斗争，都可以写。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服务，是不是每一部片子最后都必须出拳头拿刀子？不一定。主要还是看我们怎样处理题材，看我们站在哪一方面。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这类片子不是一律不能写。有些帝王做过一些好事，有些还反对过外国侵略，是可以写的。但反动的东西不写。封建迷信宣传的不能写。关于鬼戏，要是光是为鬼而鬼，这类东西不拍。但把鬼作为一种反抗的寄托，像《聊斋》，那就可以写。黄色的东西不宜搞，也不能流于低级趣味。在香港要拍好电影也要求我们深入生活。只有深入生活，抓住灵魂，写的东西才能打中要害。在爱与恨的问题上，爱要爱得彻底，恨要恨得残酷，要打动人的心弦。喜剧、讽刺剧都可以搞，关键是题材要抓对，要言之有物，要对准靶，要结合现实。关于卖座不卖座，不能无条件地把卖座的要求抛弃了，只是不能无原则地追求卖座，要在思想性、艺术性的基础上卖座。有较高的思想性、艺术性，同时又场场满座，那就皆大欢喜了。关于经营管理，很赞成搞些制度，提三点要求：勤俭办事，发挥大家积极性，保证一

定的产量^[19]。

(四) 开办中资企业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政府在港澳的中资企业分作接管的国民党留港企业和中国共产党投资的企业两类。前者有中国银行、中国旅行社、招商局、交通银行、中国植物油料厂、中央信托局、中国农民银行、中国保险公司和太平洋保险公司等^{[19]324}；后者有香港华润公司和澳门南光公司。

中国旅行社1927年创办于上海，原是一家民间企业。1928年开办中旅社香港分社，主要业务有客运、货运、旅馆、游览、出版等。1949年上海解放后，中旅社实现了公私合营。1951年7月，中国银行香港分行接管了中旅社香港分社，后转交中侨委正式接收，经过重组，民营转为国营，于1954年6月独立注册为“香港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港中旅承担海外华侨往来祖国、入境回乡的手续、交通、住宿等业务，从1962年起，开始承担国家“供应港澳鲜活冷冻商品三趟快运货物列车”到港货物接运交货工作；协助办理海外客商参加广交会的签证手续并提供相应的旅行服务；为尚未与中国建交国家的友好人士入境办理签证及相关接待；还开展了有关旅游、客货营运和贸易业务^{[20]60-65}。

中国银行原是清末“户部银行”，后改称“大清银行”。1912年，南京临时国民政府把“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1917年在香港开设支行，归广州分行管辖。1919年香港支行升为香港分行。1928年，郑铁如担任了中银香港分行经理，推动分行成功进入香港外汇市场。1950年1月，郑铁如率分行员工起义，宣布脱离国民党行列，保护行产，接受中国银行总行的领导，被总行重新委任为香港分行经理。1950年6月，中国银行总管理处驻香港总稽核室由项克方担任总稽核，统一领导在香港的15家国营金融机构，不包括公私合营机构。1952年中国政府成立了公私合营银行驻港联合办事处，统一领导各行在香港的分支机构。1958年联办撤销，旗下金融机构统一归中国银行总管理处驻港总稽核室领导。1965年底，中国银行领导的中资银行共14家，包括中国银行香港分行、交通银行香港分行、广东银行香港分行、南洋商业银行、宝生银行、华侨商业银行香港分行、盐业银行

香港分行、金城银行分行、中南银行香港分行、新华银行香港分行、国华银行香港分行、浙江兴业银行香港分行、集友银行和中国银行澳门分行^{[20]36-41}。

1964年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召开海外行会议，对香港中资银行的工作作出明确规定：充分利用香港的有利条件，大力配合内地对香港的出口和转口贸易；加强华侨服务，努力吸收侨汇；努力吸收存款，壮大资金力量；适当开展当地业务^{[20]47}。

招商局旧称“轮船招商公局”，清政府最早的官督商办轮船公司，成立于1873年。1932年，国民政府收购民营股份，将其改为“国营招商局”。1948年初，国民党为筹集资金，又改为“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1949年2月，招商局香港分公司成立，注册时亦称“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5月，上海解放，市军管会接收了招商局上海总公司及各地分公司的资产。1950年1月，香港招商局领导人汤传篪、陈天骏率全体员工宣布起义，回归祖国，带来的15艘海轮及不动产成为人民的资产。1959年，香港招商局被中国政府委任为中国远洋船舶在香港的总代理。1962年起，内地来港中转货物也全部由它承办。

香港华润公司和澳门南光公司都是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投资的红色商贸企业。华润公司的前身是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粤华公司）于1938年夏秋之际开办的“联和行”，经理是秦邦礼^②。抗战胜利后，联和行改名“联和进出口公司”，1948年12月又在港注册为“华润公司”，董事长钱之光，总经理杨琳。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另一家企业“广大华行”并入华润公司。华润公司是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香港为中国革命服务的有力工具。华润在从事公开合法的商贸活动的同时，以商贸为掩护开展广泛的秘密工作，以支持党的军事、统战、经贸等活动。193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重大涉港行动往往通过华润来落实。如抗战时期，配合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保管和运送海外华侨的捐助，协助八路军、新四军在港澳海外采购药品、通讯器材、运输车辆和兑换外币；解放战争时期，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分批将350多位著名民主人士和700多位文化名人和爱国华侨安全运抵解放区；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局实行统购统销政策，收购的农副产品及煤炭等大批物资通过华润控

制的货轮运抵香港，转销海外。换取的外汇则用于购买西药、纸张、电讯器材、布匹、轮胎等军用物资，支援解放战争；1949年，华润根据党的指示派人打入国民党在港机构，成功组织了招商局和两航起义（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等。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对党在香港的所有贸易机构进行归并，由华润统一领导。1952年10月，华润公司根据中央决定由中办管理的党产转为国务院外贸部领导的国企^{[21][212]}。1955年，华润公司根据国家政策与13家外贸总公司签约，成为在港中国对外贸易的独家总代理^{[21][236]}。

南光贸易公司是中共港澳工委根据中央精神于1949年8月在澳门投资创办的商贸企业，总经理由澳门分工委负责人柯正平担任。当时周恩来和叶剑英提出：“在澳门这一特殊地区，必须有我们自己的机构与组织。”^[22]南光公司成立后，进行了支援广州市解放、海南岛解放和万山群岛解放，为北方解放区输送粮食等短缺物资的任务，以及抢运“两航起义”的航空器和抗美援朝期间抢运“禁运”物资支援朝鲜战场的斗争。与华润相同，南光也是肩负政治使命的公司，属于国务院国资机构领导的央企。在五六十年代中国遭受西方国家封锁的条件下，华润、南光两家公司“积极组织货源，港澳爱国工商业家不避风险，鼎力襄助，内地建设所需大量物资，包括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前线急需的药品、油料、轮胎等‘禁运’物资，被秘密运往大陆；内地出口货物主要是大米、活禽、蔬菜、鲜蛋、水果、鱼类、烟叶等农副产品，大都通过香港转口。在西方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时期，香港、澳门成为中国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转口贸易的重要通道。”^[23]

注释：

- ①参见《中央同意中侨委关于港澳报刊工作的意见》（1956.6.6），中央档案馆。
- ②秦邦礼（1908-1969），中共党员，党内名为杨琳，又名杨廉安，江苏无锡人，秦邦宪（博古）的胞弟。

[参考文献]

[1]金尧如.中共香港政策秘闻实录[M].香港:田园书屋,1998.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83.
-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580-581.
-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36-337.
- [6]评美国共产党声明[N].人民日报,1963-03-08(1).
- [7]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53-355.
- [8]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1886-1976)(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1800.
-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1949年7月-1950年3月)[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 [10]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室.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附卷1上、下)[M].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2000:151,551.
- [11]梁上苑.中共在香港[M].香港:香港广角镜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132-133.
- [12]李谷城.香港中文报业发展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328-329.
- [13]徐铸成.香港《文汇报》创刊前后[M]//钟紫.香港报业春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271.
- [14]陈昌凤.香港报业纵横[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 [15]廖承志.坚持爱国主义的办报方针[M]//本书编辑办公室.廖承志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357-360.
- [16]本书编辑委员会.生活书店史稿[M].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95:403.
- [17]蓝真.五十年从头细说——利落商务印书馆的一段重要历史[M]//范用,等.“三联”忆旧.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343-344.
- [18]廖承志.港澳和海外出版工作要因地利制宜[M]//本书编辑办公室.廖承志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292-294.
- [19]廖承志.关于香港的电影工作[M]//本书编辑办公室.廖承志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407.
- [20]郭国灿.香港中资财团[M].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9.
- [21]吴学先.红色华润[M].北京:中华书局,2010.
- [22]李祖荣,等.璀璨南光——南光(集团)有限公司的历史贡献与文化精髓[J].企业文明,2012(2):18-42.
- [2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1949-1978上)[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121.

(责任编辑:周凤)